

“被误读的让-雅克”：论卢梭在近现代中国之译介及其影响

韩伟华

卢梭常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预言家和“精神导师”。《社会契约论》则被视为法国革命政治实践中试图落实的公民普选和直接民主等诸项政治原则的理论源头。然而，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与后世对其的诠释和运用常常相去甚远。卢梭生前已预见到自己的著作可能被他人误读、误用，为此他晚年撰写了《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1772年）。在此书的扉页中，卢梭告诫读者道：“不知本作品会落入何人手中。如果我斗胆提出一个请求，那便是：恳请你们在处置本作品甚至在向任何人谈起本作品之前，将它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我事前便可以肯定，我不会得到这种恩典。”¹ 卢梭去世一个多世纪之后，当其思想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对它的误读与曲解也就在所难免了。²

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对卢梭的译介与误读

中文世界最早介绍卢梭思想的学者，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1901年11月至12月的《清议报》中，梁启超分三期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卢梭学案》。他在文中大声疾呼：“改造中国专制政体最近、最易的道路，就是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³ 1902年7月，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刊发了题为《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的文章。不过据现代学者的考证，这两篇文章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对法国学者阿尔弗莱德·福耶（Alfred Fouillée）《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中关于卢梭社会哲学一节的复述。福耶的《哲学史》于1875年问世，1886年由中江兆民译成日文，不谙法文的梁启超是以日译本为底本来编译他的《卢梭学案》的。⁴

就在梁启超发表第一篇中文论文向国人引介卢梭之际，《社会契约论》的首个汉语全译本也在1902年问世了。留日学生杨廷栋在其《路索民约论》的“译者记”中如此写道：“从此茫茫大陆，民约东来。”杨廷栋不识法文，据考证其译本是从原田潜的日译本译而来。杨廷栋一改“卢骚”的常用译法，改译为“路索”，可见他将《民约论》的作者视为探“索”救国之“路”的精神向导。不过经比较发现，杨廷栋译文与卢梭的原文有相当大的出入。读杨廷栋译文与其说是在读《社会契约论》，还不若讲是在读一篇声讨清政府专制暴政的政治宣言。译文是否忠于原文，并非其关注的重心。⁵

其实这样一种“六经注我”式的译介方式，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晚清国门初开之际，要国人直接接收西方的政治理论还是颇为困难的，多数学者只能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

¹ 详见卢梭：《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袁树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² 参阅吴凌雅：《卢梭思想东渐要事汇编》，《现代哲学》2005年第3期，第39-57页。Wang Xiaoling, *Jean-Jacques Rousseau en Chine (de 1871 à nos jours)*, Editions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s Amis du Musée Jean-Jacques Rousseau, 2011.

³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0页。

⁴ 参阅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载《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58-61页。

⁵ 详见吴凌雅：《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汉译及其影响》，《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第88-90页。

来解读卢梭。故此，又有学者试图将卢梭“洋为中用”，以便更加迅速地将之引介到中国来。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好以古书生新义”的刘师培。他在1904年与林獬合编的《中国民约精义》中，以卢梭的《民约论》为经，以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典籍为注脚，将卢梭的民约论纳入到儒家的道统中，力图论证卢梭的民约思想也正是我国历代圣贤所倡导的精神。⁶《中国民约精义》的主旨，是从卢梭《民约论》中“最重公私之辨”的立场出发，论述政治应以体现公为真正目的，批判中国传统以君为国家主体的主张。⁷

尽管到了二十世纪初，经过梁启超、杨廷栋等人之译介，卢梭的民主思想已在中国知识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恰如马君武在《帝民说》（1906年）中批判杨廷栋译本的不足时指出的那样，“译者固不知卢氏所谓。读者亦不知译者所谓也。”⁸1918年马君武翻译了以法文原文为底本的《足本卢梭民约论》，此译本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多次再版，成为民国时期流传最广的卢梭著作中译本。但与多数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近代学人一样，在马君武看来从事功层面来译介卢梭才是当务之急。他同样不是在忠实地翻译卢梭，而是试图通过民约论来向国人作革命宣传。在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下，西学首先是作为思想启蒙和革命的口号而被引介到中国来的。“翻译的政治”或“政治的翻译”，也不可避免地使马君武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卢梭思想的真谛之外。⁹

二、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界对卢梭直接民主理论的批判

1915年创刊的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杂志，在尚未留意到马克思之时，已将卢梭列为重中之重了。卢梭鼓吹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契约立国和公意等理念，确是传统中国政治哲学所缺乏的。引进这些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辛亥革命及之后的国民革命打的是卢梭和法国革命的旗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更为激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与卢梭的民主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¹⁰然而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在接受卢梭思想时，未免过于突出了卢梭对建立民主政治所持有的激进和乐观的特性。对于卢梭民主政治理想的实践可能性及其复杂性，则疏于思考和检讨。¹¹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卢梭在中国知识界正面的革命导师形象逐渐淡去。随着卢梭的政治著作被较系统、准确地译成中文，学界开始转而反思卢梭民主思想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当代中国反思卢梭思想与极权主义渊源的学者，顾准（1915-1974年）无疑是第一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顾准不惮以戴罪之身发愤著述，去烛照包括卢梭在内的历史幽暗。这些成果主要

⁶ 董增刚：《激进与保守抑或认同与扬弃：以近代思想家对民约论的不同评价为视角》，《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6-27页。

⁷ 详见杨德贞：《从「完全之人」到「完全之平等」——刘师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台大历史学报》第44期，2009年12月，第109-114页。

⁸ 《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7-229页。

⁹ 参阅张晓溪：《自由平等思想的逻辑演绎——马君武与卢梭之透视比较》，《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第23卷第1期，第46-50页。

¹⁰ 详见高毅：《法国革命文化与现代中国革命》，《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第76-81页。

¹¹ 林启彦：《卢梭民约论与近代中国民主共和思想之兴起》，香港大学历史系1983年博士论文，第238-240页。

体现在他生前未能发表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中。¹² 顾准反思《社会契约论》的贡献在于：他发现直接民主是个内含巨大隐患的政治悖论。卢梭的本意是借它来演示“主权在民”，以挑战“主权在君”的专制体制。但越是夸饰直接民主的眩人迷面，便会愈加悲剧性地导向其反面。1793年的法国雅各宾专政、1917年的俄国革命及1950至197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度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多次揭示了 this 政治悖论。¹³

198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由批判文革逐步推进到反思为何政治激进主义在近现代中国长期盛行不止，卢梭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其中的代表人物非朱学勤莫属。朱学勤在其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序言中毫不掩饰地直言道：“本书写作时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他自叹道：“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¹⁴ 朱学勤在1989年发表的题为《为什么要对比研究文化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问答录中，更是将中国的文革看成是“1966年的雅各宾专政”。他以为毛泽东的潜意识中怀有一种对文明进步的怀疑心态，这非常接近卢梭。朱学勤强调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论、对少数人不施行仁政论等理论的施行后果，无不与卢梭思想的操作结果相吻合：两者都是从追求道德至上走向恐怖统治。¹⁵

作为朱学勤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直接促使了王元化在1990年代对于卢梭问题的再思考。使他进行这次反思的深层原因则是：为何“左倾”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为什么1949年以来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等历次思想批判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王元化发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阐释普遍、特殊、个体三环节的关系时，援引过《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作为例证，黑格尔和卢梭都认为普遍性可将特殊性和个体性囊括在内。对此，王元化不禁感叹道：“囊括了特殊性和个体性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之外，哪里还有独立自在的个性呢？”王元化认识到将卢梭的哲学直接运用到国家学说中的危险性。¹⁶

最近，夏中义在纪念其导师王元化的长文《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从思想史看王元化重估〈社会契约论〉》中作了非常精辟的小结：顾准、朱学勤、王元化三人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关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其动机与其说来自学术意识，不如说源自问题意识。因为这些思想者的真正内驱力是：卢梭不仅是一位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更是活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凝重符号。通过对“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问题的梳理，夏中义提醒我们，中国知识界百余年来对世界近现代民主思想谱系的了解，除了从“卢梭→罗伯斯庇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条主线之外，还应关注到有另一条从“洛克→密尔→严复→顾准→朱学勤→王元化”与中国的连线。¹⁷

¹² 详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¹³ 夏中义：《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从思想史看王元化重估〈社会契约论〉》（上），《档案与争鸣》，2011年第1期，第11-12页。

¹⁴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版，第11-12页。

¹⁵ 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年，第106-110页。

¹⁶ 详见《王元化集》卷六“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8页，第273-309页。

¹⁷ 详见夏中义：《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从思想史看王元化重估〈社会契约论〉》（上），《档案与争鸣》，2011

三、卢梭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面孔

中国知识界对于卢梭学说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漫长历程。但无论是将卢梭视为民主革命的先驱而大力褒扬的一方，还是将其当作极左激进思潮的始作俑者而批判的另一方，其实对于卢梭的法文原著均知之寥寥。¹⁸ 评论卢梭政治思想的中国知识份子，多只能通过有限的中文译本来理解卢梭。

好在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界“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新背景下，这种“卢梭注我”式的现象已有了可喜的改观。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文世界对卢梭的关注逐渐从思想界转入学院派内部。刘小枫、甘阳等在欧美受过系统训练的新一代学人，自2000年起开始主编系列丛书“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目的在于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计划中的中文版卢梭注疏集包括“笺注本卢梭著作集”与“解读卢梭”两大部分。前者拟翻译出版卢梭几乎所有的著作，其中《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科西嘉政制》、《山中来简》、《剧作选》等卢梭晚年的重要文本，更是将首次被译成中文。对于已有中文译本的卢梭著作，则力图依据最权威的法文版《卢梭全集》进行重译。

之所以要对那些已有中译本的卢梭著作进行重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先前的译本所依据的底本存在不少的缺陷；二是现有的中译本对于法文本中颇为详尽、重要的导论和注释，不是完全弃之不译，就只是象征性地选译了一小部分。何兆武翻译的《社会契约论》自1958年初版以来，几经修订已重印20余次，堪称中译本中的善本。但与法文版的《社会契约论》相比，差距仍不可小觑。普及版的法文本《社会契约论》，就同时将《社会契约论》的日内瓦手稿本与1762年的定稿本同时刊印，以便读者对比其间的异同。《社会契约论》的中文新译本，就应当将日内瓦手稿本一并译出。

为了使中文学术界能够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卢梭著作的微言大义，中文版卢梭注疏集还将同步推出“解读卢梭文集”。恰如刘小枫在“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的缘起中所指明的那样，西方典籍的汉译虽已逾百年，但中文“学界的解读似乎仍在吃夹生饭、甚至是吃生米”。卢梭的著作即便都译成了汉语，并不等于说汉语学术界就有了解读卢梭思想的能力。为此，就极有必要系统地译介一批晚近欧美学界最重要的诠释卢梭的研究性论著，作为导读性的辅助材料。

最后我们衷心地期待，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译介之后，卢梭的真面目能够最终展现在国人的面前。

韩伟华，197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雷蒙·阿隆政治学研究中心，政治学博士，目前任教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在《史学理论研究》、《史林》、《政治思想史》、《二十一世纪》(香港)、《北大史学》、《知识分子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关于法国近代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研究论文。

年第1期，第8-10页。

¹⁸ 参阅袁贺：《一个人的卢梭——评朱学勤的卢梭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第64-74页。